



HEAVENS
HORROR

Strangers Always

永远的异乡客

战时上海的一个犹太家庭

[美] 瑞娜·克拉斯诺/著 王一凡/译



上海三联书店



HEAVENS
HORROR

Strangers Always
永远的异乡客

战时上海的一个犹太家庭

[美] 瑞娜·克拉斯诺/著 王一凡/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异乡客/[美]瑞娜·克拉斯诺著; 王一凡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10

ISBN 978-7-5426-2612-7

I. 永… II. ①瑞…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0927号

永远的异乡客

著 者/[美]瑞娜·克拉斯诺

译 者/王一凡

审 校/李亦敏

责任编辑/戴 俊

装帧设计/张德馨

监 制/研 发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7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10月第1次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15.5

ISBN 978-7-5426-2612-7

定价: 24.00元

前言

1977年，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上海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上海最主要的街道——南京路上，人流熙熙攘攘，街上尽是来去匆匆的人们，他们无不怀揣着对明天的美好理想，对生活的执著热情——这样的场景和别的城市那种让人沉闷的单调无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海给我的另外一个深刻印象，来自于那里风格各异的建筑，它们几乎反映了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各个建筑流派的艺术风格，这证明上海当时已成为东西方文化与艺术交汇的国际大都市。

那以后，我又曾多次回到上海，发现它一天比一天生气勃勃，一天比一天活力四射。现在，上海新建了很多现代酒店，丝毫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逊色，它们迎接着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的游客。在提出所谓“消灭阶级分化”的口号之后，由于对基础建设的普遍忽视，上海的城市发展受到严重损害，这是事实。不过，现在你再也看不到本书中所描写的饥民横尸街头的悲惨情景了，出于同样的原因，你也看不到过去那些富商名流在仆人的伺候下，出入高楼大厦和各种俱乐部的场面。玛莲·德烈奇^①主演的电影《上海》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上海那种乌烟瘴气、纸醉金迷的形象，如今也只

^① 玛莲·德烈奇，Marlene Dietrich，译者注：生于德国的女演员，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走红，后前往好莱坞发展，成为派拉蒙影片公司的著名影星，《上海》是她1932年主演的影片。

有游客和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那种一掷千金的奢靡生活能勉强与之相比。

讲述上海发展的历史故事实际上就是回顾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沧桑经历。中国为了抵制鸦片的流入，开展禁烟运动，却成为西方国家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并强迫中国开放对外贸易口岸，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将上海的部分地区划为外国势力的管辖范围——居住在这些区域里的人不受中国政府和法律约束。在最早的时候，中国的外国人聚居区一直采取自主管理的方式，但是他们通过任命官员，仍然对中国政府负有责任，实际上，这样一种团队责任制和中国当时的行政管理体系没什么两样，直到今天，这样的管理系统仍然以“单位”的形式保留了下来，每个中国人都隶属于某个单位。但是当时西方人（还包括日本人）显然不满足于此，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的租界面积，加上他们在中国各省占领的领土，实际上，他们把这些不受管辖的殖民地变成了无人过问的自由区。不管谁住在租界以内，即使是中国人，也完全不受中国政府的控制，所以租界也就成为密谋推翻国家统治之人的避难所，成为煽动变乱的文学作品等各种文化活动的中心。这种不受任何管辖的租界招致中国人民的深深怨恨，它们给外国人提供了各个方面的特别待遇，甚至包括外国政府有权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便保护自己的国民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之一，同盟国开始逐步取消他们的这些特权，1947年之前，最后一个租界也终于被撤销了。

上海只是当时有外国租界的港口之一，但是它的规模和地理位置却使它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十分多元化，这和其他的一些大城市如纽约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上海的居民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却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忠诚。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使得当时上海的社会异常复杂。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很多旅居上海的外国人写了不少关于上海的书，着重描绘了那里的独特氛围和异国情调。但是到了最近，这些肤浅的文字开始被学者的严肃研究所取代——工会、文学社团、教育机构、秘密政治运动以及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状况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成为一系列博士论文和专著书籍的研究主题。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听到那些在二战前及二战期间，也就是上海处于它国际地位最鼎盛时期，亲身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的声音。不过，现在这样的声音也逐渐开始出现了——如郑念的《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Francizka Taussig的《通向上海之路》(Shanghai—Passage，越南文：Verlag fur Gesellschaftskritik，1987年)等等，它们的出现是非常及时的，因为如果这些亲身经历过旧上海的人也去世了的话，我们就再也没有办法从第一手的资料中重温当时的情景了。所以说，我们的运气足够好，才有了手上这本瑞娜·克拉斯诺在战时日本占领上海期间的见闻记录。

在过去的数年中，我很高兴通过中国—犹太研究所(Sino-Judaic Institute)的工作认识了瑞娜，我们都是研究所的成员，她主要负责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她是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人，对新鲜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心，聪慧机敏，对自己的生活又洋溢着无限的热情，和她交谈总是让人入迷又富于启发。从本书中描写的年代开始，她先后居住在日本、韩国、菲律宾、以色列各国，现在居住在美国。通过在世界各国的游历，她不断开阔着自己的眼界，语言方面也取得了越来越高的成就。有趣的是，在本书中你可以看到，在瑞娜年轻的时候，她的这些个性特征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正是这些独特的性格使得她的文笔既引人入胜，又深刻透彻。你在这里还可以看到，瑞娜以日记形式记录她自己的经历(她的记录正是以这样的日记为基础)，她对于很多事件的描述都非常鲜活真实，让人有身临

其境的感觉，但是更重要的是，她还以更开阔更深刻的视角描述了一个永远离我们而去的时代和社会。瑞娜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只属于其中的一分子，但是她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那个小小的部分中，在她的笔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对一系列人和事有趣而引人深思的描述，而且还能够和她一起，通过她的双眼，去看当时的世界。

阿尔伯特·E.戴恩(Albert E.Dien)

于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学系

自序

在珍珠港事件和日本占领上海之前，上海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社会，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层。在外国人中，地位最高的阶层是由各个大国(如美国、英国、法国等)的代表组成的。紧随其后的是德国，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德国战败，德国人便丧失了在中国的一些特权。然后是一些“较小”国家，如希腊、土耳其、西班牙、意大利、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等国的公民，逐渐退出特权阶层。

在这些自命不凡的持有护照的外国人之下，是一些没有国籍的人，他们主要是从1917年俄国革命中逃出来的俄罗斯白人，以及从国内混乱局面和反犹太运动中逃出来的俄罗斯犹太人等。虽然按照官方的划分标准，他们是一个单独的群体，但是实际上，他们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此外，犹太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塞法迪(Sephardis，源自中东而非西班牙)和亚实基拿(Ashkenazis，源于欧洲)；后来又出现了第三个新的分类——从希特勒犹太大屠杀中逃出来的流亡者们。

接下来的一个社会阶层则由欧亚混血人组成，他们的命运很不幸，既受到白人的鄙视，又遭到中国人的排挤，他们居住的地方无人问津，这样的生活状况通常也给他们的心理带来毁灭性的创伤。

那么中国人呢？他们人数众多，却生活在被压抑被奴役的社会

背景下。外国人和他们的关系通常仅限于生意上的往来，以及与中国佣人以及商店老板的日常交往。很多白人从来没有被邀请到中国家庭中做客，他们也没有在自己的房子里招待过任何中国客人。

不过，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永远改变了上海的面貌。虽然在1933年之后，日本人通过对中国的不宣而战（日本人将其辩称为“中国事变”The China Incident），占领了上海外围约1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是在当时，他们还是被迫尊重了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中立地位。但是珍珠港偷袭事件的发生，以及随后而来的太平洋战争，为日本占领整个上海城扫清了最后的障碍。胜利的入侵者把“敌国国民”关进战俘集中营，在占领军队的大发慈悲下，没有国籍的人则仍然被困在城市中。我就属于后者——一个没有国籍的俄罗斯犹太人。

在整个战争期间（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我坚持详细地写下日记，并保留了很多剪报，它们激起了我的兴趣，成为我的消遣——更多的时候，它们记载了我的愤怒。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尽管我也经历了战争、动乱和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迁徙，但是这些记录仍然保留了下来。唉！我的那些日记啊！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日记本是我8岁生日时母亲送给我的：厚厚的红色本子，还可以用钥匙把它锁上。后来，我又在日本Gohdo文具店买了很多硬皮的笔记本来记日记（我最喜欢的是一本带有波尔卡风格的圆点图案的红色本子），每次我路过那里时都会跑进去看看。因为我继承了父亲对写作的热爱，任何与书写有关的东西都能吸引我极大的兴趣：纸张、信封、铅笔、钢笔，甚至鹅毛笔的笔尖都让我着迷。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一直热切地阅读着关于上海的文学作品，希望能够找到在殖民主义丧钟敲响的那一关键历史时刻有关上海的第一手报道，却总是徒劳无功。资料的稀缺让我不得不一次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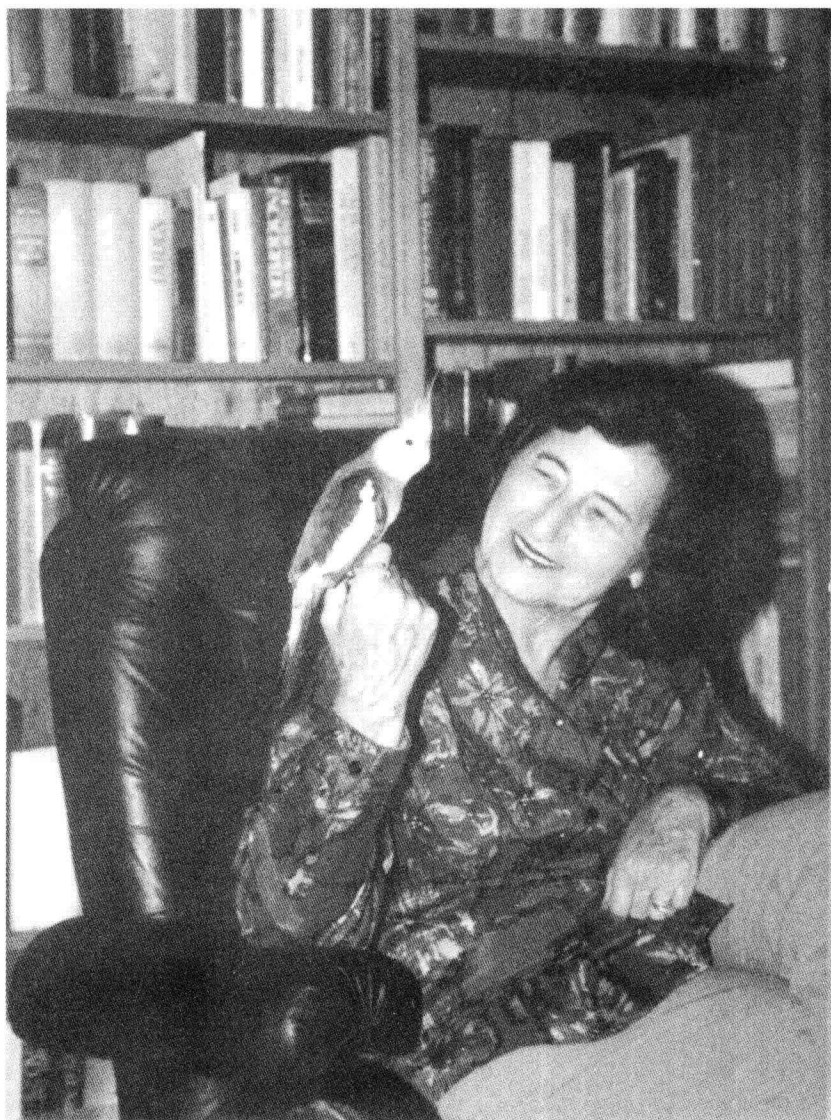
一次回过头去看我自己保存下来的那些日记和各种各样的文件，最终，我决定把它们整理出版，希望能够重温那些令人难忘的岁月，并与读者们一起分享。

本书的描写完全都是真实的，至少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是如此：数以百万计居住在上海的人对上海的多元化肯定也各有不同的看法。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书中的姓名都作了改动。

脚注的目的是为了澄清一些公众不很熟悉的历史事实，并介绍一些人物和地点在战后的命运。

瑞娜·克拉斯诺

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



如今的瑞娜和她的小鸟

1942年1月

隔离制度就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压在了当时上海外国居民的肩上。外国租界那种绝对的统治、各种优惠待遇，以及他们不受法律管辖的特权，统统一去不复返了。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时，战败的中国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向西方国家开放5个港口作为通商口岸——上海就是其中之一。后来，英国又通过威逼胁迫，取得了“最惠国”的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在此之后，中国给予任何其他外国势力的特权和豁免权，都将立刻自动适用于英国在中国的所有事务。美国和法国对英国的支配统治嫉妒不已，也分别于1844年和1846年取得了同样的地位。德国和俄罗斯也是趁火打劫，各自分得了一杯羹。

于是，在上海的市中心，一个个的“国中国”建立起来：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组织起他们自己的税收体系、法院、防御力量和学校等等。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却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

然而这种看上去似乎是要持续不变的局面却由于一个月前的珍珠港事件而发生了扭转和改变。现在，佩带刺刀、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占领了我们的城市，人人避之不及。中国人成为孤独的多余的一群人，希腊人、伊拉克人、叙利亚人、没有国籍的俄罗斯人、犹太人以及从希特勒恐怖统治下逃出来的流亡者，都只不过是中国人汪洋大海里的几滴小小的水珠罢了。1940年，德国打败法国，虽然日本人对法国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但还是有很多法国人离开上海，前往更

加安全的沿海城市，或是加入了戴高乐的自由法兰西军团 (Free French Forces)。日本的同盟军——德国人成了当时外国势力中的精英阶层，黑色的纳粹“卐”字旗不可一世地飘扬在威廉皇帝学校^①上空。

上海的街道一天比一天肮脏不堪。过去流行的英国双层公共汽车不见了，柴油、汽油压根儿就买不到，单层的公共汽车成了珍稀物品，边跑边冒出木炭燃烧后的滚滚黑烟。不过它们的样子也确实很奇怪，车子的前面是一个有点像火炉的新鲜玩意儿，排气管里喷出的是浓浓的烟尘。法国人把它叫做gazogenes，甚至还把他们高层官员的豪华汽车也改装成这种模样。丁当作响的电车成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大街小巷挤满了笨拙的手推车，它们巨大无比的独轮上是一个木头的小框，可以坐人，也可以运送些小的家禽家畜或日常用品。骨瘦如柴的老马拉着马车，让行驶的交通更加缓慢，只有那些无处不在的黄包车，能够在混乱拥挤的车流中见缝插针地杀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路来。

自从日军占领上海以后，物价也上涨了：一颗葡萄3毛钱，一个鸡蛋4毛钱，一双鞋要800到900块钱，就连坐短短的一段黄包车也要15块钱。新的货币叫做“中央储备银行券”(Central Reserve Bank, CRB)，它的发行取代了原来的法币。人行道上到处聚集着一堆堆的乞丐，在破烂不堪的袋子里抓着跳蚤。那天早上，我亲眼看到一个俄罗斯白人妇女刚从肉店出来，一个形容枯槁的中国小男孩一把就抢去了她手里的纸包，这个男孩头发又长又乱，腿上没有愈合的伤口流出恶心的脓液，他一边跑，一边就撕开包在外面的报纸，对着里面的东西——一大块生肉，咬了下去。鲜血从他的脸上滴下来，把俄罗斯女人吓得惊声尖叫。

^① 威廉皇帝学校是当时只准德国儿童读书的地方。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军队把它改建成一
处军官俱乐部。

日本人把太平洋战争叫做“大东亚战争”，宣称这场战争的最终目的是要“把10亿亚洲人民从西方殖民者的统治和剥削中解放出来”。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每天听到的不是“杀光盎格鲁—撒克逊恶魔”就是“消灭英美敌人”。

后来，日本人又提出了更极端更具有煽动性的口号——“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导致了中国人对“欧洲人”，如白人长期隐藏不露的仇恨心理。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对外国人的敌视和愤怒随处可见。我骑自行车的时候，中国的小孩子们会对我左推右撞，嘴里还叫着各种辱骂嘲笑的话。几天前，我乘坐电车买票的时候，售票员甚至也不给我找零钱，当我一再固执地坚持之后，他才把几个硬币往我脚下狠狠一扔，结果马上就被周围的人伸手抢了个精光。一天下午，在一个食品杂货店，一个中国店员也不愿意卖东西给我，还嘲笑道：“小妞，等你眼睛不是蓝色的时候再来吧！”

一天晚饭后，保姆在收拾桌上的碗碟。妈妈劳累了一天之后，已是筋疲力尽，回卧室休息了，比我小5岁的妹妹坐在沙发上剪小纸人玩。爸爸仍然坐在饭桌边，喝着加了3块方糖的深琥珀色浓茶。我也陪他坐着。爸爸一直按照俄罗斯的饮茶传统，坚决不用普通的杯子喝茶，而一定要用一整套精致的玻璃茶具，还要放在带有把手的银托盘上。这个时候，他不耐烦地看着我，气冲冲地抱怨道：

“别皱眉头了行不行！”

我努力压制住自己没发火。这个习惯可是我从他那儿学来的！不过，爸爸马上又开始后悔自己的暴躁脾气，他说道：

“这场可怕的战争简直要让我精神崩溃了。我整日整夜想的都是，那些在欧洲的犹太人正遭到有计划有系统的残酷屠杀。我们要怎么保护我们的民族，我们伟大的文化，要怎么保护我们的传统呢？纳粹把

犹太人的书籍付之一炬，他们要毁灭所谓‘堕落’的文化艺术，他们自己极端激进的理论是所有自然的、人文的感情背道而驰，但是对于任何与他们观点相左的想法，他们都要赶尽杀绝。”

爸爸说完这些，摘下眼镜，放在桌上，开始按额头。

然后，他充满深情地拍着我的手，仍然还在为开始的不愉快感到内疚，继续说道：“你知道我最热切的希望是什么吗？那就是在这里，在遥远的中国，在远离欧洲、远离希特勒、远离德国的这片国土上，建立一个犹太文化中心。”

作为实现他理想的第一步，爸爸和他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犹太出版协会”(Jewish Book Publication Society)。他们翻译并出版了很多俄国版的英文和意第绪文^①小说，还有不少由蒙代尔·莫切·塞法里姆(Mendele Mocher Sfarim)、肖洛姆·阿莱汉姆(Sholem Aleichem)、艾萨克·辛格(Israel Joshua Singer)等其他一些深受爱戴的犹太作家创作的短篇故事。爸爸还把美国作家路德维格·刘易森(Ludwig Lewisohn)的《中间的小岛》(The Island Within)译成了俄语。

除了在犹太出版协会(一般被称之为犹太出版社, The Jewish Book)的工作，爸爸还在俄文杂志《我们的生活》(Nasha Jizn)中担任编辑和主要作者的职务，这本杂志是“上海犹太民族独立民主思想的喉舌”。它刊登的文章介绍了上海犹太人的日常生活状况、犹太文化以及对中国和海外犹太人有影响的各种新闻事件，只是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政治话题。

这个月，由于很多潜在的读者群都是从欧洲来的逃亡者，根本不懂俄文，作为对他们不断提出的抱怨的回应，《我们的生活》首次刊登了整整一版用英文写成的文章。在“编辑的话”一栏，也讨论了是否要

① 意第绪文: Yiddish, 犹太人使用的德语、希伯来语等的混合语言。

增加一个意第绪文板块的问题。^①

作为负责杂志政治方向的编辑，爸爸一方面必须保证不违反日本审查制度的控制，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文章对犹太人群体可能产生的强烈反响。这样一来，他也就永远地处于一种担惊受怕和内心反思的矛盾心理之中：他既不愿意撒谎，又不愿意对日本占领军队溜须拍马，但又被迫只能报道事实的部分真相。

第一期《我们的生活》正式出版之前，这本杂志的“创始元老”们定期在我家的客厅聚会讨论，激烈的争辩更是随时都会爆发。像爸爸一样——所有的人都思想开明、坚定正直……也脾气暴躁！现在，由于编辑部新加入了很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波兰的流亡者，为了表示对“新人”的照顾及尊重，原本激烈的讨论也开始或多或少地变得温和起来——不过我和妹妹对此可是非常失望，因为之前我们每次听到卧室隔壁传来的那些激情高昂的争辩时，总是被逗得笑个不停：“决不！（Nikogda!）”……“无法无天啦！（Vozmutitelno!）”……“白痴！（Idiotstvo!）”……

虽然妈妈说我是“爸爸的宝贝女儿(papina dochka)”，而且如果有任何人对爸爸有一丝一毫的指责，我都会坚定地维护他，但是，由于爸爸的出版工作和他在犹太群体中的各种社会活动不断占据了她的时间，我也开始渐渐怨恨起他工作的繁忙来。于是，有一次当爸爸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怒气冲冲地发表了一长通抱怨之辞——什么“那些书、那本杂志、那些从欧洲来的没完没了的逃亡的人抢走了爸爸”之类的话。然而我立刻就后悔了，我屏住呼吸，夹紧胳膊，等着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可是没想到爸爸并没有冲我大吼大叫，他看上去情绪非

① 后来杂志新增了整块的英文和意第绪文板块，所以实际上它也就成为了一本包含三种语言的杂志。

常低落，他说道：

“是，《我们的生活》和犹太出版社，还有各种各样的协会组织让我不得不辛苦地工作，很多很多时候整晚都睡不着，但是，难道你不明白，在这个灾难性的时期，我们都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实际上，多亏了你妈妈承担起赚钱养家的重担，我才能够把自己全部的时间用来从事那些紧迫而重大的任务。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我们正处于犹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历史时刻吗？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共渡今天的难关，我们的未来就注定会灭亡。”

他暂停了一下，喝了口茶，然后愤怒地高声说道：

“我不相信盟军急于把我们从纳粹的统治中解救出来！美国和英国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不让犹太人从欧洲逃出来。一些流亡者甚至被送了回去，他们面临的命运让人不敢想象。”

虽然爸爸和我都一样容易头脑发热，还经常相互吵闹，但是我爱他胜过爱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

1921年，爸爸从海参崴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来到上海，和他同行的还有另外几个同样热血沸腾但是身无分文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一起挤在一间犹太人旅店的阁楼上，由于没有钱吃饭，他们饿了就吃善良的老板娘免费提供的大块厚面包充饥，渴了就一杯接一杯地喝餐厅桌上一直免费供应的热茶。

在准备成为一个先锋者的日子里，爸爸的同伴们向熟练的中国工匠学习做鞋和编竹筐的手艺，但是爸爸却由于急性阑尾炎，无法活动，失望之极。就在爸爸的朋友们都辗转前往心目中的圣地的時候，爸爸却不得不在上海接受手术，并留了下来。没过多久，他就遇到了

① 父亲的一个同伴，M. A. 诺瓦梅斯基(Novomeysky)后来建立了死海钾盐公司(Dead Sea Potash Works)，另一个同伴，埃夫泽诺夫(Evzeroff)是在进入耶路撒冷的路口修建雄伟壮丽的大会堂和音乐厅——Binyanei Hauma的发起者。